

# 《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摘要

安德烈亚斯·威默：《国家建构：聚合与崩溃》，叶江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摘要选自原书“绪论”章。

---

## 为什么是国家建构？

---

为什么一些国家通常沿着族群断层线而分崩离析，而另一些国家虽然拥有多样化的人口，但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都仍然在一起？换句话说，为什么国家建构在某些地方获得成功而在另一些地方却遭到失败？本书所演示的就是各种世代相传的缓慢移动过程如何影响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国家建构前景。在中央集权国家早已出现并统治数代、数十代人的地方，公民们在今天说着同一种语言，因此就能更容易地跨越族群、种族和地区的分界线而建立政治联盟。继承了官僚集权传统的政府也能为其公民提供公共物品，从而鼓励他们在政治上支持国家并培养他们的忠诚感。最后，公民社会组织的早期兴起使政治家们能够将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编织成一片政治网络。这些弥合分裂的联系减少了族群在政治上的显著性，削弱了对分裂主义的支持，使暴力冲突和战争不太可能发生，最终导致公民认同国家并将其视为一个团结一致和共享政治命运的共同体。

政治整合（political integration）和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fication）由此构成了国家建构的两面。要实现这两者，至关重要的是要建立公民与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这种政治联系跨越族群分界线（ethnic divides），并将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整合进一种包容性的权力安排之中。如果公民通过权威和拥护的关系与政府相互连接，那么就会出现一个包容性的国家共同体，国家建构由此可被认为获得了成功。我认为，这种联系是通过民主选举还是通过其他政治机构产生，并非主要应该关注的问题。相反，不是所有的民主制都能成功地建立一个整合的国家。例如，美国在其民主实体存在的前70年中维持着奴隶制，并在奴隶制结束后的另一个世纪中在政治上排斥非洲裔美国人，从而造成了主从关系和种族隔离。

这种对国家建构的理解与大多数当代政策制定者的理解不同。在美国领导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后，西方智库、政府和军队的专家们试图制定能在短短几年内就促进国家凝聚的计划。他们经常在使用“国家建构”这个术语时与民主化等同起来（Dobbins 2003–2004），或者更广泛地将“国家建构”与西方军队在遥远的地方推翻当地政府后重建国家等同起来（参见 Osler Hampson and Mendeloff 2007的总结）。在美国，这一辩论的大部分基本假设是，其政府认为适合，就有权推翻世界各地具有威胁性的政权，只要政府能以自己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形象

“重建”这些国家并“教导那里的人民自我治理”，一位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如是说（Fukuyama 2004: 162）。

本书则与其他一些著述（Mylonas 2012; Sambanis et al. 2015）一起努力从这些辩论和假设中拯救国家建构的含义。本书提出一套不同的政策处方。正如本书最后一章所论述的那样，如果国内条件并不利于跨越族群边界的政治融合，那么通过外部力量来进行国家建构，就如在阿富汗、伊拉克和波斯尼亚所做的那样，其结果很可能是失败。更重要的是，如果目标是在陷入困境的各国中培育政治凝聚力，公共物品就需要由当地政府而不是由外国人来提供。此外，本书介绍的国家建构的构造理论表明，在美国总统的一个或两个任期内是无法修复失败国家的，也无法建构起国家。国家建构是几代人而不是几年就能完成的事情。

## 对现代化著述的现代化

对国家建构的这种理解直接跟随早期的、现在基本被遗忘的社会科学的著述。诸如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 1953）、莱茵哈德·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 1964）、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 1963）和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 1972）等知名学者，试图了解在那时新近因非殖民化而独立的非洲和亚洲诸国所面临的政治整合的挑战。正如我在本书中所做的那样，他们将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国家建构区分开来：通过创建国旗、军队、国歌、铸造新币和印刷新护照来创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并不能保证本国公民能认同这一新国家或保证他们接受该国家的权威。这些学者还区分了政治稳定和国家建构。并非所有保持和平的新民族国家都是因为国家建构取得了成功而维护了和平。在许多新独立的国家，专制政权持续了数十年。这种稳定是无情镇压的结果，而不是政治上对国家的成功整合。

第一代研究国家建构的学者还确认和标示出国家建构所经常带来的冲突及其所面临的障碍。从殖民地独立而新建立的国家政府比其殖民地前任更能侵入地方的日常生活，地方的人们由此会抵制这样的国家政府。各路政治精英为控制这一新的权力中心而你争我夺。经济贫困、人为划定的边界、殖民者原先分而治之的政策遗产，以及羸弱的国家能力等使得国家政治整合困难重重。第一代国家建构问题的学者——本着自马克斯·韦伯以来的历史社会学经典传统——毫不犹豫地勇于做比较：主要以广泛的历史类比的形式，将从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学到的经验教训迅速应用于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

在论证这些比较的过程中，大多数作者依赖于现代化理论：他们认为现代官僚制的引入、加速沟通和信息流动的技术变革，以及赋予下层阶级公民权利都会改变国家与国民之间建立关系的方式，无论是明治时期的日本、俾斯麦的德国，还是当代印度。换言之，他们视国家建构为一种挑战，这种挑战来自无论什么地方产生的现代性使以前规模较小且自足的社会单位彼此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思想流派展开了批评，批评其忽视这些新国家中的阶级剥削和它们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的持续依赖。新兴理性选择流派的支持者们批评国家建构的研究学者们，认为他们没有问为什么自私自利的人会从事像“国家建构”那样理想而崇高的事情。多元文化主义的倡导者们则指责国家建构者们侵犯少数群体的权利并通过强制

同化而摧毁他们的文化（例如，Connor 1972）。方法论学者强烈反对国家建构研究者“扶手椅理论创建”的习惯及其倾向于总是挑选适合论证的范例，避免对消极和积极案例进行更系统和训练有素的分析。很快，这个关于国家建构的话题被放弃了或归入其他研究领域，如对内战、经济发展、民主化等的研究。

本书重新激起了对国家建构这一主题的早期兴趣。像第一代学者的作品一样，它追求广泛的比较议程，将我们带到世界各地，上下几百年来引入现代民族国家模式的任何地方：一个国家应该以平等公民组成的民族的名义，而不是以上帝或王朝的名义来统治的理想。这种情况出现在19世纪的瑞士和比利时、20世纪初的俄罗斯和中国，以及20世纪60年代的博茨瓦纳和索马里。以下各章详细讨论了这六个例子。

然而，与前一代该课题的学术成果不同，本书精确地识别和确定国家整合的发生过程，而不是指向现代化的抽象力量。并且本书不是收集说明性的例子来支持广泛的理论主张，而是用更高的分析精度和方法论的严谨性来探究旧有的问题。我使用三对精心挑选的国家案例来说明培育国家建构的特定机制如何在历史过程的细节中运作。然后，本书通过对大型数据集的统计分析来证明这些机制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同样起作用。因此，本书有效地利用“嵌套方法”（nested methods）设计，其中将不同的研究策略结合起来支持相同的理论论证（参见Lieberman 2005; Humphreys and Jacobs 2015）。如果这些不同的实证调查导致相同的结论点，那么就应该增加我们对所假设的诸因果力量确实在世界上的“那里”起作用的信心（关于方法原则的更详细讨论，参见第一章的讨论）。

## 国家建构问题的重要性

---

但是为什么要复苏国家建构这样一个如此深刻地根植于冷战时期的观念的问题？当时西方的决策者们和社会科学家们都认为全球南方新独立的国家能够现代化为西方式的民主、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社会，而不是转向西方的共产主义对手（参见Latham 2000）。更重要的是，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后国家时代，越来越多的人拥有多个公民身份，在各大洲之间来回迁移，组织跨国社会运动，并在自由流动的数字信息和通信流推动下创造新的后国家的身份，谁又需要一本关于国家建构的书？换言之，是不是研究国家建构已经过时了？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的原因有三个。

首先，国家建构带来和平并且促进经济发展。在之前的研究中，我和我的同事们证明，缺乏跨越族群分界的政治整合经常导致内战（Wimmer et al. 2009）：在很大一部分人口没有代表且他们在国家层面的政治和政府中没有发言权的国家中，武装叛乱到处蔓延。如果边缘化群体的精英可以逃脱监视并招募追随者，并且如果国家对这种初步动员作出不加区分的暴力反应，那么武装冲突就很可能发生（Lindemann and Wimmer 2017）。简而言之，国家建构的失败是内战的一种原因。

就如伯尼尔和瓦格斯帕克的研究所示，族群政治的排斥还会抑制经济增长（Birnie and Waguespack 2011；另见 Alcina et al. 2016）。以族群为中心（ethnocratic）的统治者青睐支持由自己族群背景的公民主导的企业、经济部门和职业。因此，他们选择并不利于整体经济的政策。相反，东亚发展型国家的成功显示出，国家的政治整合——而不是不受政府干预干扰的自由市场，或曾经所谓的华盛顿共识——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前提（参见Rodrik et al. 2004）。

其次，国家建构的主题很重要，因为不仅仅在全球南方，世界上许多社会都在与过去遗留下来的族群政治的不平等做斗争。苏联解体后的许多继承国都面临着与20世纪60年代从殖民帝国独立的新成立国家所面临的相同挑战：区域整合解体、分裂主义、族群精英之间不断升级的政治竞争，等等。乌克兰最近的事态发展说明了这一点。在许多立国已久的国家，民族政治（national political）的整合问题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支配着国内政治，其中包括比利时、玻利维亚、埃塞俄比亚、西班牙和英国。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放眼望去，民族政治整合几乎没有其他选择。欧盟，曾经是那些认为后国家时代正在到来的人们的王牌见证，似乎已经在更高的欧洲层面的“国家建构”上失败了，就如希腊的金融问题和随后的难民危机所显示的那样。对那些自己所持有的世界愿景依然还是由19世纪和20世纪的国家建构工程所塑造的人而言，泛欧洲团结的观念很难被灌输进他们的头脑之中。在全球范围内、互联网无疑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流，并使新的各种后国家形式的身份认同和团结一致得以蓬勃发展。此外，对于拥有多种护照和具有全球公司所需求的销售技巧的精英移民而言，国界越来越易于穿透。但世界上只有3%的人生活在他们出生的国家之外。更一般地说，政治仍然与民主合法性相关，而民主合法性仍然在民族的国家（national states）内组织起来。同样，提供道路和保健诊所、组织军事防御和社会保障也是如此，甚至在欧洲联盟那样的超国家政治单位内也还是如此。因此，最近的西方民族主义政治运动的复兴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后国家时代尚未到来。

第三，“国家建构”术语易于去除某些人可能认为与之有关联的意识形态内涵。国家建构并不意味着“从部落到民族国家”的连续统一的现代主义”进步”（Cohen and Middleton 1970）。作为在一个领土内扩展政治联盟网络的过程，无论其性质如何，国家建构可以不必用进化论和目的论术语来理解。正如博茨瓦纳的例子所示，一个国家（nation）可以建立在“部落”（tribal）的基础上。在研究国家建构时，我们也不必持有民族主义者们的看法，他们将历史视为实现建立民族国家工程的单向道路〔参见威默和格里克·席勒（Wimmer and Glick Schiller 2002）讨论的“方法论的民族主义”〕。为了避免这样的陷阱，我将考虑反事实可能性，即一项国家建构规划或其他规划——可能聚焦于不同定义的国家共同体——可能失败了（或成功了）的反事实可能性或许会在历史斗争中胜出。比如我将详细讨论，中国可能会沿着其深刻的语言鸿沟线而崩溃分裂，罗曼诺夫王朝的俄罗斯或瑞士也可能同样如此。换句话说，做国家建构问题研究，不必假设历史上稳定的“民族”（nations）是相关的观察单位，也不必假设国家建构的成功或失败是由某种政治命运预先确定的。

这里所定义的国家建构也不是民族主义政府强迫同化少数民族的同义词（如Connor 1972），更不是寻求将同族的人们聚集在国旗周围的沙文主义运动使少数民族成为替罪羊的过程。恰恰相反，族群（ethnic groups）之间的政治平等是国家建构的关键决定因素，就如稍后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压制甚至肉体上伤害少数群体的个体显示出该国家建构计划已经失败，而不是表明它正在走向成功之路。

有一个例子似乎足以说明这一点。俄罗斯罗曼诺夫帝国垮台后，在乌克兰，一个独立的、尽管是昙花一现的国家，通过新成立的民族主义政府和军队的宣传，伴随着乌克兰民族大众认同的各种标志而兴起。它显示出在俄罗斯内战期间，英勇的哥萨克部队在与布尔什维克和反布尔什维克军队的战斗中，保卫着统一的乌克兰国家。在这些年里，乌克兰的犹太人遭受了一些历史上最严重的大屠杀，其中许多犹太人就是同样被这些武装部队杀害的。在国家建构成功的案例中，比如瑞士和博茨瓦纳，当然也同样有很多民族主义言论和仇外心理，特别是在国家建构的早期阶段。然而，这些言论和心理从未直接针对国内的少数群体，且从未达到过草菅人命的程度。

也许是时候暂停一下并从规范的观点简要讨论国家建构了。鉴于其在防止战争和贫困方面的作用，许多观察者认为国家建构是积极正面的，我个人也是如此看。然而，我们可以辩论的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根据哪种民族主义在道德上更优越、更具世界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从而拥抱“自由民族主义”的政治哲学，因为它有助于提供和平、福利和文化尊严感等公共产品（Miller 1995; Tamir 1995）。正如我之前所说，即使在国家建构获得成功和国内少数民族能融入权力配置的情况下，我们仍然会观察到新的排斥的分界线，这是规范性的问题：非国民的他者仍然处在国家的整合领域之外，并且被有组织地歧视（Wimmer 2002; Shachar 2009）。规范地说，国家仍然像其他拥有强大成员权利的政治共同体一样，是存在问题的。

就什么是能在其中促进政治整合的适当单位而言，我也是个不可知论者。我们应该在庞大而异质化的国家提倡国家建构、还是规范性地优先选择诸如爱沙尼亚、亚美尼亚或哈萨克斯坦等更小、更同质化的单位来建构民族国家更可行？我没有听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论辩来证明，为什么像韩国、波兰和冰岛那样的同质性国家应该比像印度、坦桑尼亚和瑞士那样的异质性国家更优先考虑来进行现代国家建构，尽管在经验上，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多种语言国家的国家建构确实更加困难。这就意味着研究国家建构既不反对分裂，也不提倡分裂。这种为研究所支持的规范性不可知论表明，分裂和建立更加同质化的国家并不是建立未来和平的一种处方（Sambanis 2000; Sambanis and Schulhofer-Wohl 2009）；族群同质的国家也不因此而更和平（Fearon and Laitin 2003; Wimmer et al. 2009）。同样，大型经济体与那些对贸易更加开放的小型经济体一样可以促进增长（Alesina et al. 2005）。小型和大型，异质和同质——所有国家都面临着政治整合的同样任务。本书旨在了解这种政治整合在哪些条件下能够取得成功，而不是证明它应该如何的道德理想的世界中进行。

## 论证

---

### 第一章

为了理解为什么国家建构会失败或成功，我想使用所谓的“关系”视角，并将其与交换理论的诸要素结合起来。从关系的视角来看，个人与组织之间的联系构成了社会的核心。我们因此并不聚焦于管理行为的制度规则、协调决策的市场逻辑，或驾驭行动的个人动机，就如其他的理论方法那样。相反，我们试图了解政治联盟是如何形成的，一方面是国家层面的政府之

间，另一方面是志愿性团体、政党、专业组织等。

这些关系有三个方面：它们如何组织、它们交换什么样的资源，以及合作伙伴如何相互协商和沟通。对于这些中的每一个，我确定了一个关键因素，这个关键因素使联盟能够达到跨越区域和族群的界线，产生包容性的政治权力配置，从而培育和促进国家建构。第一章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理论。第二章到第四章通过分析三对国家的历史来展示这三个因素是如何运作的，每一对国家和每一章说明三种机制中的一种。

## 第二章

组织方面关系到政治联盟所假定的制度形式。它们可以以临时形式出现，例如当投票反对实施特定政策的承诺时，或者在紧急情况下将被庇护者政治忠诚与恩主的支持交换时。或者他们可以完全制度化，就像拥有强大独立政党的国家那样，或者有着诸多志愿性组织（如地方的政治俱乐部、读书会、工会、专业协会等）的国家那样。

志愿性组织帮助建立跨族群共同体和地区的联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将个人利益捆绑在一起，使政治家或国家机构能更有效地与他们联系。相比之下，在恩庇赞助系统中，每个联盟都需要单独管理：恩主或赞助人需要在个人基础上为每个被庇护者或客户提供政治保护或政府的关爱。大体上，与政府的接触因而更受限制。再者，志愿性组织可以相互建立横向联盟，例如加利福尼亚州所有当地护理协会的联盟，因此联盟网络可以横跨全境和跨越族群分界扩散开去，从而形成一个全国性的伞形组织。相比之下，恩庇系统倾向于在权力较多和较少的行为者之间垂直传播，因此往往在族群共同体内而不是跨越族群分界展开。

这样的志愿性组织的发展程度十分重要，尤其是在专制君主政体被推翻或者前殖民地获得独立的国家过渡到民族国家的最初几年，这显得更为重要。如果这些组织的密集网络已经出现，新的权力持有者可以利用这些网络来扩展全国范围内的权威和支持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在国家层面的政府没有代表的少数民族群（ethnic minorities）甚至多数族群（ethnic majorities）难以维系，因为志愿性组织往往已经在该国各地的不同族群社区建立了分支机构，新的政治精英即从其中招募。

这在第二章通过比较瑞士和比利时而获得了经验的证明。18世纪末和19世纪上半叶，在瑞士由于境内所有主要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也由于政治体制的分散和民主性质，志愿组织——射击俱乐部、读书会、合唱团等——在整个领土上扩展。相比之下，在比利时，拿破仑以及在拿破仑灭亡后加冕的专制的荷兰人国王压制了这些民间社团。更重要的是，比利时的民间社团持续局限于更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的法语地区和讲法语的群体。

当比利时于1831年从荷兰王国独立出来时，该国的新统治者与这些讲法语的社团网络相互连接在一起。他们将法语定为行政、军队和司法等的官方语言。尽管讲佛兰芒语的人们形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少数群体，但是其人口却不是这些社团网络的一部分并且被统治着，直到19世纪末一直作为内部殖民地。早期的国家建构失败了，语言问题后来变得非常政治化。该国现在沿着语言的分界线接近分裂。

在瑞士，向民族国家过渡发生在1848年短暂的内战之后。赢得战争并统治国家几代人的自由派精英依靠已经存在的跨地区、多族群的（multi-ethnic）民间社会组织来征召追助者和领导者。因此，政治精英就像整个人口一样是多族群的。在之后的大部分历史中，语言的多样性从未成为瑞士的严重政治问题，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 第三章

政治经济学层面所关注的是国家与公民之间如何相互交换资源。公民更有可能在政治上支持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来换取向公民收缴税款、会费和各种费用的政府。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基于在武力威胁下的掠夺——就如在民族国家之前存在的那些典型的更具强制性的政权。某个政府越能够在一个国家的所有地区提供公共物品，其作为交换伙伴的吸引力就越大，并且更多的公民将愿意尝试与该政府中心建立联盟。政府精英的构成方式会反映出这种包罗万象的联盟结构，并由此也反映出人口的族群多样性。

第三章所阐述的就是上述第二种机制，并对索马里和博茨瓦纳进行了比较。在博茨瓦纳于1966年成为一个独立国家时，其政府为了牛的健康和卫生设施有效地扩大了出口机会，并在会定期摧毁养牛经济的干旱期间提供紧急救济。这些举措给国内所有地区平等地带来利益，并且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在公共物品的分配方面存在对某些族群的偏袒。相应地，执政党获得了跨地区和跨族群选区的支持，这反过来又使得议会和内阁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人口的族群构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包容性的权力配置导致对国家和茨瓦纳多数族群的强烈认同，久而久之，越来越多的少数族群便逐渐融入其中。

在索马里，国家建构的条件就不太有利。英国和意大利的殖民地统一成独立的索马里之后，该国几乎没有能力向国内全体人口提供公共物品。快速扩张的官僚机构由外国援助来滋养，其特点是宗族和血统的庇护主义，以及地方普遍腐败。西亚德·巴雷（Siad Barre）的军事政变只是暂时改变了这种态势。由于缺乏体制能力，他的政权试图通过军事风格的运动来提供公共物品，例如该政权派所有的初中和高中学生到农村去教游牧人口如何阅读和书写，而不是通过全国范围内的基础教育体系来这么做。政府无法以这种方式在索马里的各个宗族之间建立持久的政治联盟。巴雷越来越依赖自己的（以及他母亲的）宗族联盟的忠诚追随者来巩固自己的统治。那些在权力的游戏中失败的人憎恶这种具有族群偏向的权力结构。促使宗族联盟不断变化和军阀混战的内战很快就爆发了。

## 第四章

第三方面涉及在谈判建立政治联盟时各行为体如何相互沟通。我认为，如果不同的个体间能用共同的语言互相交谈，那么建立跨地区和跨越族群分界线的联系就更为容易。这可降低“交易成本”，易于作出了解彼此意图所需要的努力、解决分歧和谈判妥协，并由此建立持久的信任关系。根据多伊奇早期的国家建构理论，语言分歧因此会导致在一国领土范围内减缓政治网络的扩展。

第四章通过比较19世纪早期到20世纪末的中国和俄罗斯帝国，说明传播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中国的全体居民说不同的语言，这应该使国家建构更加困难。但是信件、报纸、书籍和政治小册子都用统一的文字写成。这种统一文字的本质使得讲不同语言的居民可以轻松地相互理解。在整个帝国时期，经典文字的同质性也使得中国宫廷能够通过书面考试制度招募其管理者和军队指挥官，而没有给帝国中持任何一种语言的人以特权，这反过来又确保了政治、军事精英与整个居民人口一样是讲多种语言的。这个士大夫阶层中的各政治派别也包含了来自所有语言群体的成员，19世纪后期形成的反帝制民族主义会党成员也都是如此构成的。这些民族主义势力在国民党领导下于1911年推翻了帝国王朝而夺得政权，其权力结构由此仍然是多区域的，几乎没有语言倾斜的迹象。1949年以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也是如此。相应地，在多数民族汉族中不讲普通话的各群体从未产生过语言民族主义。汉族被认为是一个族群同质而语言多样的民族。在汉民族中，语言民族主义是沉默的。

然而，在整个俄罗斯的现代历史中，语言民族主义却做过这样的事情，帝国两次沿着族群语言（ethno-linguistic）分界线而解体：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以及1989年左右的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后。我会证明，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很难在一个全体人口所说和所写的语言极度不同的国家内形成政治联盟，这些完全不同的语言包括了从芬兰语到德语、从俄语到土耳其语、从韩语到罗马尼亚语，还用不同的文字来书写，包括拉丁文、阿拉伯文、西里尔文和蒙古文。当大众政治时代在19世纪后期出现后，政治网络沿着语言界线聚集在一起，因为用外国语言和文字来动员追随者们被证明是相节困难的。通过意第绪语宣传小册子动员犹太人能最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因此，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俄罗斯，大众政党专门迎合特定的语言共同体，或者他们类似于受到语言限制的联盟网络的拼凑物。民族意识在几十种不同的、由各种语言定义的模式中加以铸造，而不像中国汉民族那样在总体身份中造就。1917年革命后的苏维埃民族政策通过字母化、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教育少数民族，以及给予他们在新形成的由语言界定的省和地区特殊的权利，来巩固这种状况。这确保了在这些族群划分中会形成庇护网络。这个整合的多族群民族，即苏联领导人所梦想产生的“苏维埃人”根本无法建构起来。

## 国家形成和国家建构 ( State Formation and Nation Building )

进一步回首历史，人们想知道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和全体居民的语言同质性从何而来。我将论证，它们都是在19世纪晚期大众政治时代来临之前以及随之产生的对国家政治整合的挑战出现之前就已经建立的国家遗产。在土著精英能够垄断和集中政治权力的地方，就会出现官僚体系的政府，这此官僚体系政府习得了如何在组织上整合并在政治上控制本国的各个地区。在20世纪，或在独立之后，接管政府可以依靠这种诀窍和官僚基础设施，在全国各地公平地提供公共物品。从长远来看，政治的中心化还鼓励下属精英及其追随者们采用中央精英们的语言（或像中国案例那样，采用中央精英的文字），这样既促进他们自己的事业，又宣称拥有与政治中心相关联的声望很“高”的文化。

博茨瓦纳的案例说明了这一点，在前殖民时期和殖民时期，那里的茨瓦纳王国发展成六个高度集中和紧密结合的政体。这些王国政体在独立后被归入一个国家并被国家政府所制服，这极大地促进了在后殖民时期该国官僚机构的公共物品供应。在整个前殖民、殖民和后殖民时期，这些中央集权的小国还促使非茨瓦纳人与主导的茨瓦纳文化和语言同化，从而创造了一个语言更加同质化的社会。在索马里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中央集权的政体对其内部土地及占多数的游牧民实行统治。就如第三章所示，这代表着在后殖民时期会形成提供公共物品的障碍。因此，殖民统治常常依赖的中央化的土著国家为成功的国家建构提供了重要的背景条件，因为它们官僚系统的能力和统一的语言，有助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联系。

## 从成对案例研究到大样本定量研究

选择这三对案例是因为它们以最清晰和最有效的方式说明了这三种机制。瑞士和比利时在地理位置、人口规模和语言多样性方面相似，但在19世纪上半叶，这两个国家在志愿性组织扩展的程度方面却大不相同。索马里和博茨瓦纳同样有非洲的殖民地经历，其族群多样性程度相似，且均以养牛业为经济基础。但博茨瓦纳的后殖民政府更有能力向广大民众提供公共产品。中国和俄罗斯形成了它们自己的文明引力中心，拥有巨大的讲多种语言的人口，且都从未受过西方殖民统治。然而，中国的精英们用共同的文字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进行沟通，而俄罗斯的交流空间却因语言和文字都具多样性而碎片化。

非常明显，这些案例研究并不允许我们视三种机制中的某一种机制比其他的机制更为重要。一旦我们跨越成对的案例进行比较而不是仅在成对之中做比较，这就变得十分明显。索马里人都说同一种语言，而瑞士人在语言上更加多样化，但这两段国家建构的历史却恰恰相反。在瑞士，组织机制似乎已经就如它显示的那样，“压制”了语言多样性机制。这是否意味着组织机制总是压过其他机制？另一个交叉成对比较则表明情况并非如此。与瑞士相比，中国在1911年之前缺乏民间社会发展，但由于共享的文字建立的整合的交流空间，同样出现了类似的

跨族群（transethnic）联盟结构。换句话说，当我们仅仅在少数几个案例中进行比较时，其他条件拒绝不变，这是比较社会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

也许更重要的是，其他因素对于国家建构可能至关重要，但却未在国家个案研究中以任何系统的方式对之进行考虑。殖民地经历本身不会导致有什么不同吗？像索马里和博茨瓦纳这样的国家曾经被欧洲殖民国家所征服并为其分治政策所塑造，这可能使这些国家的政治整合的任务比瑞士、俄罗斯或中国更加困难。

或者，难道不是政治制度在确定国家建构的前景吗？瑞士、比利时和博茨瓦纳等民主国家在建立跨地区和跨族群的政治联盟方面可能更容易一些，因为它们的精英需要赢得国内居民中大多数人的选票。相比之下，在罗曼诺夫王朝或苏维埃俄罗斯、中国或西亚德·巴雷领导下的索马里等政权则依赖于较为狭隘的联盟。或者我们也许应该关注全球进程，并论证如果政府受到多元文化正义的全球观念影响，并因此寻求征召来自不同背景的精英，那么这样的政府就会更具包容性。

又或者，国家建构主要不就是经济发展问题吗？如果没有在本国的沙土中发现钻石，博茨瓦纳可能无法如此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而索马里仍然依赖于向沙特阿拉伯出口骆驼和绵羊。或者像瑞士这样宗教和语言边界不重叠的国家建构起来是否更容易？相比之下，在罗曼诺夫俄罗斯，大多数语言少数群体加入了与讲俄语和信俄罗斯东正教的多数群体不同的宗教。如果是这样的话，族群分隔可能会使政治变得更加分裂，国家建构也会因此变得更加困难。或许我们应该采取一种更为好战的观点，并论证与其他国家进行过多次战争、通过全面的战争动员将其人口黏合在一起的那些国家，它们的现代国家建构易于成功。同样，也有可能欧洲国家更容易建构现代国家，因为几个世纪的边界调整和族群清洗（ethnic cleansing）产生了更加同质化的人口，从而促使他们融入一个一致性的民族国家政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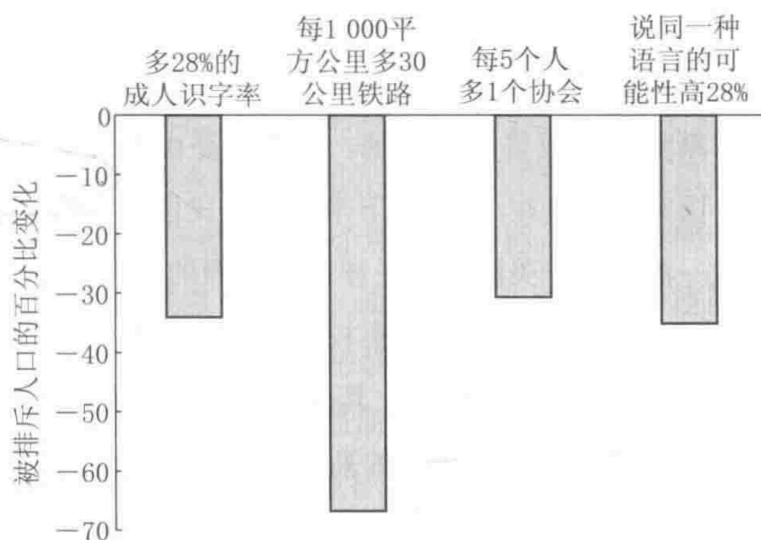
为了回答上述这些问题，接下来三章转向了另一种分析模式。这三章旨在论证同样的论点，但通过分析大量数据集，其中包含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信息，由此利用大样本研究的比较作用。这将使我们看到其他一些可能的因素是否确实影响了全球国家建构的轨迹。它还将使我们确定，我的理论所强调的三个机制在瑞士、比利时、索马里、博茨瓦纳、中国和俄罗斯等以外的国家是否都有效。

## 第五章

第五章聚焦于国家建构的政治整合特征。对于定量分析，我们首先需要测量政治整合成功的程度，以及特定国家的权力配置有何等的包容性。我和几位合著者此前一起收集整理族群权力关系（Ethnic Power Relation, EPR）数据集（Wimmer et al. 2009），提供了这一测量结果。它使我们能够确定和识别出在国家政府层面没有代表的族群共同体，由此计算出政治上被排斥人口的百分比。这些数据来自1946–2005年的155个国家，几乎涵盖整个世界，除了加勒比海、欧洲和太平洋的一些迷你小国。

在统计分析的第一步，我证明了，在人均志愿性组织很多、政府提供很多公共物品以及居民在语言上是同质的地方，政治整合更有可能。为了使不习惯于统计研究的读者能够接受这种分析的结果，我计算了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在一个普通国家，如果我们将公共物品供应减少到一定数量、被排除在政治之外人口的百分比会有多大的变化。然后，我们可以对志愿性组织的数量和最和语言同质性进行同样的计算。公共物品的供应将通过铁路轨道的密度和受公立学校系统强烈影响的识字成年人口的百分比来衡量，志愿性组织的发展则通过简单计算人均非政府团体数量来衡量。为了衡量语言同质性，我们可以计算一个国家的两个随机选取的公民说同一种语言的概率。

图0.1显示了结果，应该易于解释。每个独立变量由其列表表示，表明如果该自变量增加一个标准差，则会减少多少政治排斥。标准差测量2/3的数据与平均值的差异程度。例如，平均而言，将识字率提高28%，则被排斥人口的比例降低30%。如该图所示，族群政治的排斥与促进国家建构的三个主要因素之间的联系非常强烈。



注：这些图表基于表5.2中的模型1和模型10，并表示z标准系数。

图0.1 国家建构的决定因素

对于上文简要讨论过的国家建构的其他可能的解释，我没有找到多少证据。虽然民主国家确实比非民主国家更具包容性，但这不是因为民主导致对少数群体的政治包容。当然，排斥性的政权，例如阿萨德统治下的叙利亚，不太可能过渡到民主，因此保持着专制体制。国家如果过去有若长期的殖民经历；如果受到帝国分裂政策的特别约束；如果继承了奴隶制或定居者殖民主义的种族分化；如果经济上贫穷；如果仍然在少数群体代表的全球理想的庇护之下；如果宗教和语言分歧重叠；或者如果有长期的国家间的战争或族群民族主义冲突的历史，那么这些国家的国家建构将遭遇失败的论点也得不到什么支持。

在第二步中，我论证了语言上更加同质化的社会以及能够提供公共物品的政府，往往是由之前数百年出现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所形成的，在非洲和亚洲的案例中，即为西方殖民统治之前。这是本书介绍的国家建构的构造理论的另一个关键要素。我依据两个数据集来测量国家权力中央集权化程度。第一个来源于亚洲和非洲的74个国家，它们的前殖民政治结构记录在由

人类学家们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汇编的《世界文化地图集》（*Atlas of World Cultures*）中。这种测量方法对于新世界的定居者社会来说没有多大意义，在那里，原有的土著国家在几个世纪前就被瓦解了；对于欧洲来说，欧洲的国家要么保持独立，要么在许多代以前就被并入了罗曼诺夫王朝、哈布斯堡帝国或奥斯曼帝国。第二个是由经济学家收集的数据集，涵盖141个国家并测量在19世纪下半叶原住民国家控制当今现代国家领土的程度。这一测度对于美洲、太平洋以及欧洲的移民社会同样有意义。统计分析表明，19世纪下半叶由中央集权化政府统治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能在国内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其语言多样性也较少。

第三步是通过探询这些当地原有的高度中央集权化国家来自何方，来追溯更久远的历史。我将以一种更为试验性的方式来评估关于领土国家兴起的一些经典论证，从蒂利的著名论断“国家制造了战争，并且战争又制造了国家”到更近期的国家形成的人口和地理理论。我发现蒂利式的观点很可能适用于西方国家形成的历史，但不适用于世界其他地区。在西方以外，拥有高高山脉和深深谷地的国家似乎已经发展了中央集权，也许是因为农民无法通过迁移而逃离，国家建构者们因此而更为成功。在世界各地，人口密度高到足以支撑中世纪术期的非生产性政治精英的地方，后来就出现了中央集权的领土国家。通过这一分析，我们得出了地形和历史前因等因果力，这些因素不可能受到当代国家建构的影响。用社会科学术语来说，它们可以被认为是“外生的”（*exogenous*）。因此我们可以停止在历史道路上拖延，避免进入无限倒退的黑暗领域。

## 第六章

第六章聚焦于国家建构的第二个方面：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和对国家的忠诚程度。在具有由相似的多数族群或少数族群组成的包容性统治联盟的国家，民族主义应该更受欢迎。那些与中央政府交换网络紧密相连的人与那些被视为二等公民而在国家层级政府中没有任何重要代表的人相比，应该会更发现那种认为民族/国家（*nation*）是一个团结一致和共享政治命运的大家庭的想法是合理的。

为了考察探讨这一假设，我与我的研究助理团队一起，收集组建了一个数据集，该数据集基于全球123个国家，约占世界人口约92%的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所有的调查都包含同样的问题：“你作为自己国家的一位公民有多自豪？”我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粗略的指标，用于表明个人在多大程度上内化了社会世界的民族主义观。通过将这些调查中的族群背景问题与族群权力关系数据集中的族群列表相联系，我们可以探询被排斥的群体是否较少认同其国家，从而通过群体层面的分析来证实整体层面的论点。64个国家内的223个族群可能适用于这样的研究。

根据交换理论的论点，更具排斥性国家的公民对他们的国家不那么自豪。在族群层面，受歧视群体的成员对他们自己国家的自豪感远远低于在国家层面得到代表的群体。平均而言，在从1（根本不自豪）到4（非常自豪）的自豪尺度上，受歧视的个人比得到代表的个人低1.5分。在一个更动态的分析中，我还证明，最近失去权力的群体比其他群体更缺乏自豪感，因为他们与中央政府的交换关系不太有利。

## 第七章

第七章侧重于本书的中心思路。本章把公共物品供给作为加强国家建构的三个关键因素之一进行着重讨论。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大量文献认为，族群多样性会阻碍公共物品的提供。一些作者认为，这是因为个人无法跨越群体边界轻易合作，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他们无法就国家应提供什么样的公共物品达成一致。然而，以本书所倡导的长期和历史的观点来看，在语言多样性和公共物品供给程度低之间产生统计关联的因果过程是不存在的。

相反，正如前面几章所论述的那样，高度多样性和提供公共物品的低能力都会出现在没有中央集权国家历史遗产的社会中。第七章通过统计分析论证了这一点。一旦我们在方程式中包括对国家过去中央集权水平的测量，多样性和公共物品供给之间的统计相关性就会消失。这可以通过对公共物品供应的一系列不同测量和对多样性的一系列不同测量来证明。

因此，本章提出应重新审视多样性与公共物品供给之间的联系，并将这方面的研究纳入长期的、历史的视角之中。总的来说，本书认为多语言人口在国家建构中取得成功的可能性确实较小，但正如第七章所示，这并不是因为多样性对公共物品的供给不利，而是因为如果公民说许多不同的语言，则在一国的领土范围内建立政治网络会更加困难（第四章和第五章）。然而，正如许多经济学家会认为的那样，多样性与地形不同，不是人类交互领域之外的“外生”变量。多样性不是命运，而是历史的产物。它在国家形成和国家建构的长期过程中被内生地（endogenously）转化和变更。

## 第八章

最后一章梳理了前面几章的分析所产生的政策意涵。如果民主不是国家建构的理想处方，那么外人可以做些什么来将一个国家的人们团结在一起？能做的并不是那么多，这是本书的答案，是建立在长期历史的视角之上的。毕竟，诸如继承中央集权国家地位的传统之类的历史遗产是不能事后操纵的。此外，如果国家建构确实是由本书确定的三个缓慢移动的力量所驱动的，那么国家建构需要时间。在后殖民时代，任何外部力量都没有足够的合法性或必要的耐力来持久等待政治联盟网络在不同的领域蔓延。最后，从外部提供公共物品并不能像国家政府通过提供安全、教育、基础设施、医疗设施等那样有效地建立这种政治联盟网络。

第八章以阿富汗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实证地论证了这一点。在过去十年中，各种公共物品项目确实鼓励了那里的人们认同自己是阿富汗国家的成员，而不是某个族群或穆斯林成员。这为公共物品供应如何促进国家建构提供了一些直接证据。相比之下，由国际非政府组织或美国军方提供的公共物品项目远非国家建构的有效手段。此外，外国赞助的项目甚至增加了对塔利班的支持，而不是像“赢得人心”战略所预期的那样减少对塔利班的支持。

这些警示性说明并不应该让我们得出结论认为，根本不能做任何事情。第一，外部行为者可以通过国家政府引导资源，尽管这可能首先意味着投资于他们的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诸如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机构长期以来一直专注于这种能力建设，并且已变得更擅长此道，尤其是因为与许多西方政府相比，它们并不遵循直接的政治议程。因此，对这些组织的支持可能是促

进全球南方的国家建构最有希望的方式之一。外部行为体也可以继续支持志愿组织，这些组织为族群恩庇网络提供了替代方案；他们可以帮助资助建立强大的公立学校系统，以教育孩子们掌握本国语言。

第二，即使历史条件不利，政治技艺也可以帮助整合一个国家的人群。第八章的统计分析表明，一些国家在政治上融合多元化人口方面做得相当不错，尽管这些国家缺乏政治中央集权的历史，提供的公共物品也很少，并且要对多语言的人口进行治理，或仅有很少的志愿性组织。其中的许多特殊国家由致力于包容性国家建构计划的熟练国家领导人长期进行管理的。

第三，外部行为者可以识别这些领导者，并在政治上支持他们。在一些国家，致力于国家建构目标的政治运动可能已经在与排斥性的、族群主义的政权作斗争。对这些政治运动和领导人的外部支持可能最终会导致更具包容性的权力格局，从而促进未来的和平与繁荣。遗憾的是，在绝大多数当代冲突中，识别这种政治力批是非常困难的。外部支持甚至军事干预虽然从短期外交政策的角度来看可能是权宜之计，但是如果当地的政治家们尚未致力于实现国家建构这一目标并且不能集聚足够广泛的联盟来实现这一目标，那么从长远来看，这些外部支持和干预可能无助于国家建构。

## 定位论证

我将比较我的总体论点与最近社会科学研究中占据突出地位的其他论点，从而总结本绪论。本书的理论和实证的发现可以很容易地用图形来表示（参见图0.2）。本书的前半部分阐明主要的机制如何形塑三对国家案例的历史发展，后半部分使用统计技术和全球数据集来确认这些机制对世界各国的平均影响与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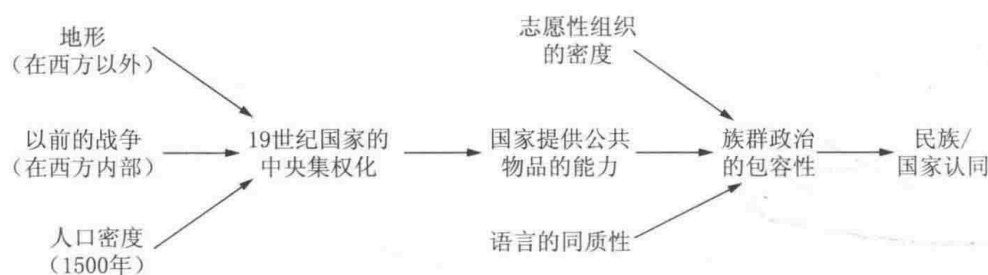


图 0.2 简要的论点

在将本书与广义定义的相同领域内的其他著述进行比较时，主要关注点的某些差异变得很明显。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 1975）及其后的一系列作者（Vu 2009）对现代早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崛起感兴趣。在本书中，我聚焦于早期中央集权国家对19世纪和20世纪民族/国家整合前景的影响，以及聚焦于过去的国家中央集权对当前的国家建构产生影响的机制。许多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献都探询民族主义出现的原因并确认其形成的主要结构性力量，比如印刷资本主义（Anderson 1991）、工业化（Gellner 1983）、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从间接到直接统治的转变（Hechter 2000），或者在将古代族群传统重置于民族主义叙事中的知识分子的作用（Smith

1986)。在本书中，我不询问为什么世界的各种民族主义愿景会出现，而是询问它们随后在多大程度上被人们所实现和采用。

其他有关国家建构的探讨方法聚焦于快速前进的当代过程，例如精英与其选区之间建立联盟的逻辑（Slater 2010；Roessler 2011），或国际行为体的作用，例如敌对国家所扮演的角色（Mylonas 2012）。本书提出的国家建构理论突出强调结构转变，而不是寒来暑往。从长远来看，关系网络是进化的，并且相对独立于全球的推测、国际干预或联盟政治，所有这些都重塑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政治发展的方向，就如我们将在案例研究中看到的那样。

一些著名的理论家已研究了偶然事件（Sewell 1996）、政治运动与国家之间的跨国联系（Subrahmanyam 1997）或者政治领导（Read and Shapiro 2014）如何形塑各种历史轨迹。本书的六个案例研究当然包含大量材料来支持这样的历史观：瑞士和比利时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索马里的西亚德·巴雷与苏联建立了深厚的联系；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受到了通过日本所获得的欧洲思想的启发；没有拿破仑，比利时的历史也许会走另一条道路；如果博茨瓦纳没有其才华横溢的第一任总统，它可能看起来不会像今天那样。但是，本书将其他的结构性力僵放在限制范围内，在这一范围内，各种事件、跨国影响和意志坚强的个人能够移动历史轨迹。如上所述，在这些结构性力量不利的情况下，政治技巧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升国家建构的前景，但却只能在这些力量确定的范围之内行事。若要将此变成一个隐喻的图像，我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世界的某些地方是被某种植被所覆盖，而不是解释某一特定的鹿群（偶然）穿过森林。

在两本寻找对长时段内社会的“成功和失败”进行解释的畅销读物中，意外偶然事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两本书值得作更进一步的讨论。两本书的实证重点再度略有不同。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为什么国家会失败》（Acemoglu and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2012）主要对经济增长感兴趣，而福山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Fukuyama, *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2014）试图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在几个世纪以来保持稳定而有些国家则陷入无政府状态。根据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说法，经济在有利的制度环境中发展：个人财产权得到保障，政治制度居础广泛且具有包容性。资本主义民主国家通过熊彼特（Schumpeter）的创造性破坏为创新和生产提供动力，形成维持高增长率的必要经济动力。

同样，福山明确了稳定的国家所具有的三个特征。它们需要具备政治权力和有能力的政府管理部门：没有官僚的国家做不了多少事，在其领土内没有建立暴力垄断的国家也做不了什么事。各国政府还应该响应广大民众不断变化的观点和利益，最好（但不一定）是通过定期的多党选举来实现。最后，一个稳定的国家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的：公正的官僚们公平地遵守法律规定而不偏袒他们的家庭、亲属或部落。

这两部作品都没有提供太多的因果论证，但却像食谱书一样提议：要有一个成功的社会，你需要有 X、Y 和 Z 等成分。但是，两本书没有分析为什么历史这位主厨会将某些成分放入这个社会的锅中，而将其他成分放入另一个锅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观点在这方面更为明显：他们认为，可以没有这样的分析，因为作为主厨的历史是随机组合各种成分的，这一观点得到了经济学同行们的掌声（Boldrin et al. 2015）。为了说明作为纯粹的偶然性历史理论意味着什么，请想象一组实验室老鼠，每只代表一个不同的国家，在食物稀少的迷宫中四处奔跑。一些老鼠完全出于巧合最终会撞到一扇门，挤过去之后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有很多食物的良好制度环境中，其他不太幸运的老鼠则继续挨饿。

然而，如果与强烈的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观念相结合，这个观点也仅限于某种真正的理论：幸运老鼠能挤出去的开口必须是单向门。但就如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展示的那样，历史充满了逆转。早期现代威尼斯拥有良好的制度，但随后出现了坏的制度。在凯撒终结罗马的原始民主之前，罗马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因此，在历史的实际情况中，迷宫里的门是双向的。有些老鼠很幸运能够穿过通向制度化天堂的大门，另一些老鼠则从未碰撞到这扇大门，还有一些老鼠发现了这扇门，但却通过另一扇门回到了稀缺的境地。国家的“成功”或“失败”很随机，我们不太知道为什么。

本书提供了一种更为确定的历史观。实验室中的所有老鼠并非都是一样的。有的老鼠比其他老鼠胖——我冒着过度引申的风险继续使用这个比喻。肥胖的大老鼠穿过通往国家建构的大门的可能性始终低于瘦老鼠最终到达那里的可能性。用更实质性的术语说，诸如索马里这样的在19世纪晚期还没有形成国家的社会，最终将在150年后从政治上整合为现代国家的可能性要远低于中国，而中国有两千年的国家中央集权化历史。